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真实

ZhongguoZuojia

JingdianWenku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短篇 报告文学

〈四〉

卷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1050232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ZhongguoZuoJiaJingdianWenku

中短篇报告文学

〈四〉

卷

陈可雄 著



淮阴师院图书馆1050232

光明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军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编:10005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495印张

2002年6月第1版 2005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0套

ISBN 7-80145-554-1/I·66 定价:2290.00元(全七十六卷)

前 言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能真实，学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学的昌盛，才能确保有深刻底蕴的持久不衰的昌盛。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其文学之盛更是代代相习，薪火不断。中国当代文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产生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声誉的优秀作品和许多文才横溢、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以宏扬新文学、新文化为己任，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从新时期文学的成绩中得到滋养与熏陶，特联合光明日报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国作家经典文库》，本文学作品几乎囊括了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所有精品，是每一位文学爱好者乃至普通中国人所必读的文学范本，必将对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发展直到整合过去，指引方向的积极作用。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直属主办的刊物，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大型文学月刊。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几代著名作家几乎都是它的作者，其权威性不言而喻，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代里，中国文坛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家与作品脱颖而出。为了回顾和检阅二十多年来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实绩，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发起，光明日报出版社共同参与编撰的此套《中国作家经典文库》，如期问世。张宇、何申、谈歌、关仁山、徐坤、肖克凡等一大批老、中、青三代优秀作家的倾力加盟，为本套文库增辉添色；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诸多体裁的优秀作品空前集汇，计有七部长篇小说及报告文学 11 卷，64 位重点作家专集 41 卷，散文 12 卷，短篇小说 2 卷，中短篇报告文学 7 卷，诗歌 3 卷，共计 76 卷，这些优秀作品与作家集合到一起，以文库的形式展现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崭新风貌，并眺望未来文学的发展道路，是新世纪之初文学界翘首已久的大事。基本涵盖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坛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大批的优秀作品构成了二十年来华语文坛的扛鼎之作，经过时间与读者的历练，成为公认的传世经典，必将融入民族的血液当中。继而泽被后世。

本书编委



目 录

陈可雄卷

葛洲坝工程的决策内幕	(1)
------------------	-----

彭子强卷

本届政府没有分洪	(21)
----------------	------

张建星卷

酸雨	(97)
----------	------

王作人 王守义卷

极光下的梦	(152)
-------------	-------



陈可雄卷

葛洲坝工程的决策内幕

发源于青藏高原格拉丹东大雪地的长江,在高峡危谷中呼啸湍急地奔流 600 余公里,过三峡至西陵峡口南津关,转流向南,江面豁然开阔。峡口下游 3 公里处,江心兀起两个沙洲,左为西坝,右便是后来牵系了一代中国人梦魂的葛洲坝。

1970 年隆冬,数万名军人和民工冒着刺骨的寒风在此结集待命,等待着一个极为神圣的时刻到来。

据史书记载,葛洲坝形成于 6 千年前。它是一座古城旧址,地处要冲。历来为兵革之地,战火频仍。秦将白起火烧彝陵之战,三国吴蜀彝陵之战,均在此附近进行,使葛洲古城化为灰烬。如今,它要眼见当代中国水利史上,又一出既壮观又荒谬的戏剧拉开帷幕了。

12 月 30 日,原湖北省委书记,当时的革委会副主任张体学穿一身军装,匆匆赶到工地,对万众宣读了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赞成兴建此坝。”他宣布:尚未作完设计的葛洲坝工程采取“边施工、边勘测、边设计”的“三边”方针,即日起破土动工!同时为纪念毛泽东 1958 年 3 月 30 日视察三峡,命名此工程为“三三〇工程”。

于是,工地上万炮齐鸣,一片沸腾。惯用来表现中国人雄心壮志的口号声如雷不绝:“腰斩长江!”“首战必捷!”



于是,中国第一大江上的第一大坝——葛洲坝工程,举世罕见的仅依据一个规划性的文件,就轰轰烈烈地上马了。

时隔 20 多年后,原水电部长、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在今年初单独接受我采访时,谈到这段历史仍心有余悸:“1970 年 10 月我到阿尔巴尼亚出访两个月。走前葛洲坝工程不要说完整的设计,连正式报告还没写呢,回来却已一炮开工了。记得我刚回到部里,连水电部军管会主任张文碧都对我说:‘钱正英,你什么事都别管了,赶快到葛洲坝去!简直是胡闹,他们已放炮动工了!’”

当时唯一敢于挺身而出反对,后来又力挽狂澜、鼎力挽救了工程的林一山,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主任对我回忆说:“我不是那种说中央错了,以证明自己正确的人。但葛洲坝工程一上马,我就知道它注定要失败!”

但处于文革高潮中的 1970 年,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使他尊为“神”的地位。他的旨意宛如天子的圣旨一样,必须“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二

修建葛洲坝工程的构想,最早也是林一山领导“长办”的科研人员提出来的。

1959 年,林一山他们完成了选择葛洲坝上游 40 公里处的三斗坪作为坝址、修建三峡水利枢纽的全部设计。考虑到三斗坪建坝后,三峡电站在枯水调峰运行时泄量的时多时少,会使下游河段内的水位忽高忽低、给航运带来不利,所以要修建葛洲坝反调节航运梯级,同时接住长江这 40 公里的水头发电。可以说,葛洲坝工程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三峡水利枢纽的配套工程提出的。林一山设想:先建工程、或者至多两者同时建,三峡水库拦蓄了长江洪水和全部泥沙,葛洲坝工程不仅成本小,技术问题也简单得多了。谁做梦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笔锋一转,要先于三峡建葛洲坝工程!



这里有必要花点笔墨,介绍一下林一山。他1910年出生在胶东文登县林村,17岁到威海卫教会学校学英语,一度成为三民主义的信徒。后来他考入北平师范大学,由于“一二·九”运动促使他下决心投身共产党。此后投笔从戎,他潜回故乡组织抗日,担任了中共胶东特区的武装部队司令,解放前升至辽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1949年他参加了南下干部团,内定为广西省副主席。但至武汉,由于他在东北反对过高岗、记录在案,被贬官为中南水利部长,后改为直属于国务院的“长办”主任。

宦海沉浮,没有使林一山消沉,相反在研究了长江洪水历史资料后,他心甘情愿地做起综合治理这条大江的“总管”来。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赶到南京接收国民党水利部和扬子江水利委员会,网罗了包括号称“长江三才”的杨贤溢、杨积昭、刘鼎臣等专业人才。同时,他不甘于做发号施令的官僚,便跋山涉水勘测,潜心研究河流辩证法,使他在五六十年代,接连成功地设计、领导了荆江分洪工程、丹江口水利枢纽等,成为“长办”无衔的总工程师、中国的水利大将。周恩来极看重他,甚至当黄河三门峡淤积后,周越过水电部,请他去勘测黄河、提出治理方案。

据《葛洲坝工程大事纪要》记载:1969年10月,张体学等人到“长办”讲,不久前来湖北视察的毛主席明确不赞成修建三峡,有一普通技术员(当时“长办”的大多数高级工程师还被关押在“牛棚”)提出:可否先在葛洲坝建坝?张对此颇为重视,即请“长办”研究实施方案。

1970年1月,鄂西水电部成立,负责葛洲坝工程的勘测、设计、科研和施工准备。不久,指挥部成立葛洲坝筹建领导小组,宜昌军分区司令员、地区革委会主任李地山任组长……一个中国水利史上最大的事件,就这样悄悄地、紧锣密鼓地筹划起来。

在当时,林一山对此一无所知。他因为叫通信员把买来半路死掉的一只鸡埋掉,而终于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关进了人们称为“水牢”的“长办”大楼地下室里。那里脏水没及脚背,不见天日,黑蚊成群。林一山用一把三条腿的椅子支起蚊帐,照样吃饭睡觉。后来,他



还找到一堆水泥,竟在积水里做起水工模型来。

三

素来明察秋毫、主张“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毛泽东何以会批示修建葛洲坝工程的?时至今日,对很多人来说仍是一个不解之谜。

自从1956年毛泽东畅游长江,写下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诗句后(这几句词在“长办”被解释为:第一句在三峡建坝,第二句讲防止洪水泛滥,第三句讲崇高理想。它是在苏联专家来华以后,三峡工程已在技术等方面被证明有现实可能性时写下的,因此这不是领袖一时诗兴大发、浪漫蒂克,而是用诗的语言勾勒出三峡工程的科学蓝图和前景),在三峡建大坝,确实成为毛泽东一个念念不忘的梦想,甚至可以说成为一个情结。

其实,早在1953年“长江”舰上和1954年在汉口南行列车上,毛泽东两次召见林一山汇报长江问题,就对三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甚至曾急切地对林一山说过这样的话:“你能不能找个人替我当国家主席,我来给你当助手,帮你修建三峡大坝好不好?”后来,毛又多次找林一山讨论过造价问题,如1958年的“南宁会议”,林坚持要72亿,毛认为造价太高,国力无法承受,才作罢。

领袖的意志,使三峡工程在中国不单成为一个工程问题。1959年党内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水电部揪出了一个以副部长李锐为首的“反党集团”,罪名之一就是“反对修建三峡工程”,反三峡工程就是反毛主席、反党。

但到了六十年代,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党内斗争的接踵打击,毛泽东有点退缩了。1963年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正式表示,原来他硬要干的三峡工程现在不干了。直到1969年10月,毛视察湖北时,张体学提出要上三峡工程,毛劈头就是一句:“你武汉头上顶盆水,有什么好处?你就不害怕?”后来才放缓口气指示说:在目前备战时期,不宜



作此设想。

突然批准修建葛洲坝工程,是仅隔一年的庐山会议之后作出的。在那次会议上,就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与林彪的斗争公开化了,并剔除了“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陈伯达,取得第一回合的胜利。毛究竟出于何种考虑作出此项改变和决定的?不得而知。但后来种种迹象表明:葛洲坝工程正是契合了他的心愿而推上马的。

在中国,任何伟大的工程都是同当时的伟人的名字联在一起而流传下来的。比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那么,毛泽东呢?

四

1970年3月,周恩来总理打电话给“长办”的军代表,要他立即安排“解放”林一山,以让他赶到北京参加全国计划会议。那时才从“水牢”里出来的林一山猜测,必定与三峡工程有关。

果然,到北京会上,林就看到一份印发的周恩来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报告,说要让毛主席健在时看到三峡工程的建成。周就此还在大会上作了一番情绪激动的讲话:“三峡工程是毛主席的伟大理想,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把它修起来,否则对不起党和毛主席!”但没过几天周又把他的报告悄悄收回去了。

在会后离开北京的几个月里,林一山不断接到“周办”的电话,说周恩来要找他约谈,但后来又都推了,使林预感到有什么重要事情发生。

6月,他刚到郑州,“周办”又来电,让他即赴北京。由于毛泽东突然要提前上庐山,周恩来陪着已走了。其时,林一山从周的秘书那里得知,周想向他了解葛洲坝的情况。但又得知,周此次离京前已经原则同意上葛洲坝工程了。周恩来一贯办事谨慎,但仅隔几个月,从三峡工程跳到葛洲坝工程,整个决策为什么转了180度大弯?令林一山百思不得其解。

1970年10月30日,就是在庐山会议后不久,以“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向中央打了“关于兴建宜昌葛洲坝水利枢纽



工程”的请示报告。报告开首的第一句话就申明正义：“为了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峡出平湖’的伟大理想”。

报告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工程规模”和“工程保证”两项——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低坝,坝高为海拔 69 米,土石方约 3 千 3 百万立方米,钢筋混凝土约 4 百万立方米,淹没耕地 8 千 6 百亩,移民 1 万 3 千人。水电站利用径流发电,装机 204 万千瓦,年发电量 120 亿度,造价 13.5 亿元,力争少花钱,多办事。预计三年半开始发电,五年左右竣工。建成后,是全国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

“我们在现场进行了水工试验和研究,试验结果:泥沙虽有些淤积,但人工完全可以调节、控制,对大坝影响不大,保证不淤塞,不断航。……”

“造价 13.5 亿元”,“三年半发电,五年竣工”,“保证不淤塞,不断航”——多么诱人的数字和保证啊!但此时,勘测尚未清楚,设计也未完成,如何算得出造价多少?又何谓工程量、竣工期呢?

在中国,水利工程往往有一种“上马预算”:即人为地故意压低造价,报请中央批准上马。上去就下不来了,使预算与决算相去甚远,造成一个个“无底洞”,“胡子”工程。

五

林一山在北京等了半年。他真正见到周恩来,已是 12 月 16 日在国务院会议厅正式讨论葛洲坝工程上马报告的时候了。参加者有刚刚访朝归来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有张体学,还有中央各部委领导。

这是一个热度很高的会议。曾、张在会上甚至发誓赌咒:如果葛洲坝工程出了问题,他们愿意把脑袋割下来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以谢国人。国家计委、建委、水电部、一机部代表发言,也是一边倒,赞成上马。

林一山坐在角落里。他只在最后作了十几分钟的发言,但还是讲了,不上三峡工程,先建葛洲坝是违反长江水利基建程序的。他说,先于三峡建设的葛洲坝工程,将要独立地承担长江上游的全部洪水和泥



沙,不仅不必要地增加资本成本,而且造成技术困难。他尤其不赞成没有初步设计就匆促上马。

林的发言被一片慷慨激昂的声浪所淹没。在座的许多人侧视着他,仿佛他是唯一的不明白个中原由、不识时务的人。在场的周恩来也没说什么,只是会后单独嘱林把不同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他。那时,林才感到,实际上有一个更强有力的人物的意志在主宰着会场。

在那个年代里,衡量一个革命领导干部的最高标准、以至荣辱升降,就看你对领袖的“忠心”了。更有始作俑者,是察颜观色,投上所好。

12月17日,也就是讨论会第二天,当时任副总理的纪登奎即打电话来,说周恩来问林一山书面意见有否写好?并派人来林的住所坐等索稿。同时林还得知,是毛泽东催周恩来尽快把有关葛洲坝工程的文件报送过去,他等着要批。此时,林一山又触发了他的倔劲,用他在战争中打残废了的右手握笔,一口气写下了三千五百言。这就是后来与中共中央文件一起转发全党,有名的〔林一山意见书〕。其中的要点是

(一)首先,葛洲坝设计蓄水位为66米,在三峡水位45米时,抬高水位20米,将给三峡工程施工造成一系列的困难,而增加的工程投资也未曾作过计算。如果届时降低葛洲坝发电水位,将使在三峡施工相当一个时期基本失去作用,只能发出设计发电量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时供电系统是一个大问题。

(二)有无必要先建葛洲坝,如先建三峡第一期工程(115米方案),除发电时间较长外(最迟是7年),其它优点远非葛洲坝所能比拟。而且,葛洲坝工程的技术问题比三峡还复杂,当时还没有设计……

据说周恩来当时看了这封意见书,说了一句:“好厉害的意见啊!”他又组织国务院专门开会讨论,林一山坚持一个字不能改。周恩来问他:“你那里有多少人支持你的意见?”林回答:“‘长办’的党委和多数总工程师的意见和我是一致的。”周恩来说:“你开个名单给我,以便主席问起时,我好回答。”林逐一写出了名单。

但这一切,后来证明都已无济于事了。



1970年12月24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出了报告，认为“在‘四五’计划中兴建葛洲坝水利工程是可行的。”同时报告末尾又附上一笔：“林一山意见书一并送上，供参阅。”

赞成兴建此坝。
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
了，兴建过程中将正
遇到一些现在想不
到的困难问题，那
又是一回事了。那时要准
备修改设计。

毛泽东主席 1970 年 12 月 26 日关于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示

12月25日，中共中央草拟出批复送审稿。其中说道，“修建葛洲



坝水利枢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峡出平湖’伟大理想的实战准备。”文件中,还责成“施工指挥部,进行现场设计,在今年年内提出设计方案报国家建委审定。”而此时,距离年末仅有六天了,提出此要求颇有一点荒诞的意味。

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77岁生日的凌晨,千钧一力地大笔一挥,批准了葛洲坝工程的上马。

六

毛泽东的批示共52字,全文是这样的:

“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这是典型的毛的语言,斟字酌句,多义性,充分留有余地。它似乎把葛洲坝工程从开工,到以后的停工、重新设计,统统都预见到了。后来葛洲坝在建设中发生了重大的问题,都无损于这个批示的正确性,而归咎于一些领导人对它的理解错误。事后许多人评价说,毛泽东这是用哲学语言作的批示。

但对于一个具体工程来讲,对于一个明知尚未做好设计、又急待开工的水利枢纽来讲,这个批示过于圆熟和含义不清了。多年来,人们反复研读它,希望自己能真正理解它的含义。其实说白了,就是当时毛泽东需要这个大工程上马,又预见到它肯定要出问题。

在那时,传达毛的“最高指示”是不能过夜的。于是,可以想见它在葛洲坝工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它被理所当然地理解为“边施工、边勘测、边设计”而一炮开工。人们高喊着“为毛主席争光”的口号,万人下江,肩挑手抬,企图用人海战术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工程。

到翌年2月,进入工地的施工人员已逾5万5千多人,后来又达到10万多人。当时由于“左”的错误思潮和体制,大坝施工以近乎闹剧式地进行:

工程指挥部由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任第一指挥长兼政委,张体



学任指挥长,军区副司令员张震任政委。指挥部下一律团队建制,分别为设计团、工程团、后勤团。底下是厂房连、船闸连、大坝连、试验连,团、连长都由军队干部担任。施工队以新兵为主,原8千技术老工人被解散,有的分配去喂猪;

施工不按基建规程办事,指挥部命令破除大体积混凝土搅拌夹冰(水泥的生化热需要发散)的制度,即“不准吃冰棒”,质量控制又不严,造成已浇筑的数万立方米坝体到处是裂缝、蜂窝、狗洞;

工地还发起“千人设计、万人审查”的运动,设计人员“奉命设计”,只绘图,不签名,还要到一个个席棚去征求民工的意见。年过花甲的长江水利学院院长张瑞瑾教授和长办总工程师曹乐安等老专家,一律被要求过军事生活,早起跑步唱歌……

林一山直至1972年4月才被增补为指挥部党委会常委、副指挥长,但也是有职无权。他研究模型,提出一系列重要方案的建议,未得到重视,甚至列为反衬意见。于是林一山干脆向周恩来告假,去西北山川考察河流了。

据林一山后来说:“我和‘长办’人员断定上马的葛洲坝工程要失败,还不仅仅是因为施工混乱,最主要的是几个关键性的重大技术问题没有解决。

“首先,长江从南津关出峡后,突然90度向南急转,原河宽由300米骤然展至2100米,河床由海平面以下40米陡然上升为海拔30米,呈现出泡水、漩涡、剪刀水等各种及其复杂的流态,同时长江每年要下泄5亿多吨泥沙,工程如何顺应河势,开出两条人工航道保证通航、又不被泥沙淤积?种种模型试验都失败了。

“第二,葛洲坝大坝基础是建在粘土岩和砂岩夹层上的,含有粘土岩软弱夹层54层,其中部分已经泥化,建坝后泥化夹层会不会恶化,造成坝体滑移?没有可靠的依据。

“第三,由于没有先建三峡工程拦截洪水,使原本设计只要抗1到2万水头的葛洲坝,一下升至要独立抗11万立方米/秒的水头,大坝建筑物如何合理安置,以对洪水消能防冲,也没有成型的设计。……”



葛洲坝工地的种种问题,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了国务院。1972年4月,周恩来在机场送走锡兰总理班夫人,对钱正英说:“葛洲坝是我的一块心病。”同年10月,又发生了长江干道碍航,交通部向中央写了报告。11月,国务院决定紧急召开葛洲坝工程汇报会,一连开了三次,都由周恩来亲自主持。

至此葛洲坝上马约两年,已开挖土方 314 万立方米,石方 166 万立方米,浇筑混凝土 10.52 万立方米(因质量事故及修改设计炸除 1.62 万立方米,实为 8.9 万立方米)。设计还没有搞出来,已花费人民币 2 亿 6 千万元。

七

关于葛洲坝工程的三次汇报会,是决定葛洲坝未来命运的关键会议。我手头有这三次会议的记录打印稿,这是张体学要求“根据谈话记录整理”的,它恰也表现了张在政治上的光明磊落。我想,或许直接披露这些颇有价值的原始材料,人们更易于感受当时的气氛、接近和了解历史事实的真相:

第一次

时 间:1972 年 11 月 8 日晚 5 时 30 分至 9 时 20 分

地 点:国务院会议厅

周恩来:(看汇报人员名单)第二指挥长是谁?

李地山:是我。

周恩来:这么多指挥长!第一指挥长是谁?

张体学:是曾(思玉)司令员。

周恩来:第一指挥长、第二指挥长都是司令员,分区司令员,都没有搞过,怎么搞?容易瞎指挥。

李地山:不懂,我学习。

周恩来:完全不懂怎么能当指挥长,可以当政委嘛!(念毛泽东批示)主